

从古诗研究转向反思百年文学史研究

焦 宝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33)

摘要:百年来的文学史观是以胡适等人提出的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等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对胡适文学史观进行系统梳理可以发现,在这一文学史观支配下,扭曲和遮蔽了许多文学史实。这一史观本身并非是以文学本身为旨归的。木斋的学术研究对这一史观进行反思,实现了突破,还原了文学史的真实,成为近年来学界讨论的一个学术热点。借助木斋以及宇文所安等学者带来的方法论革新,有望实现时代学术风尚的转移。木斋的学术思想从百年文学史观中脱离出来并实现转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学史观; 胡适; 古诗十九首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6)02-0107-06

From the Research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o the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on the Literature History of One Hundred Years

JIAO Bao

(Jilin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chun, Jilin 130033, China)

Abstract: The view of the literature history of one hundred years was constructed centering on vernacular literature put forward by HU Shi and others, civilian literature, etc. Through systematically clarifying the view of the literature history put forward by HU Shi, we can find that many facts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were distorted or hidden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view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which did not take literature self as the purpose.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MU Zhai has reflected on the historical view, made a breakthrough, restored the truth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become a hot topic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id of the innovation of methodology brought by scholars such as MU Zhai, the transfer of academic fashion of the times may be achieved. The change which MU Zhai's academic thoughts success in disengaging from the view of the literature history of one hundred years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view of the literature history; HU Shi; nineteen ancient poems

中国之有文学史观念,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情。欲厘清这百年来文学史观念之产生与建构,不能不明白文学史是如何被作为问题提出的。文学史观念与文学史建构,源自于近代的文学革命。中国文学的历史本不乏革新与革命的运动,盖因中国的文学向来是“诗可以兴观群怨”、“文以载道”的文学,每每

收稿日期: 2015-11-13

作者简介: 焦宝(1983-)男,山东淄博人,文学博士,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文化传播。

大道不行,诗文之革新便成为“道”革新的口号与先声,这一点尤以中唐至宋的文学演变为典型。而时至晚清,文学被给予的变“道”之厚望,更甚于唐宋,这便是梁启超所提倡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三界革命。在《汗漫录》中,梁启超虽提出诗界革命“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而其要害却在“输入欧洲之精神”,^[1]从中可见出,这一场文学革新运动的核心旨归却是非文学的,究其根本与文学史上“文以载道”说没有什么不同。梁启超的文学革命,尤其是诗界革命归根结底是为其政治、思想主张服务的,既如此,当形势风云突变,“诗界革命”的旗手与理论家在晚清立宪运动的风潮中,便退身旧诗坛,与同光体诗人们唱和往还了。^①近代更猛烈的文学革命,出现在1915年后,“胡适”们举起“平民文学”、“白话文学”的大旗,掀起了今日文学、文化史叙说的源头——新文化运动,借助文学来改良国民性、实现国家与国民的文学转型之行动被推向了极致。

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史叙说的整个思路未曾脱离胡适所确立的“白话”与“平民”的框架,仍延续着陈独秀“三大主义”^②的思路来进行书写。因此回顾与反思一百年的文学史,便应从胡适这里寻求根源。胡适的文学史观念概括起来说,其基点建立在平民和民间至上的基础上,其直接目的在于建立白话的文学史,其根本旨归是以白话文学的普及作为实现民治的基石。

在新文化运动中,“平民文学”是一大口号。胡适提倡平民文学的目的乃在于建立以废除文言提倡白话为核心的白话文学史观。“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而为一大能事”,^{[2] (p428)}在他看来平民就是愚夫愚妇没有知识的阶级,而创造中国文学史并推动着中国文学史发展的正是这些人。而且胡适进一步指出,平民文学是活文学,庙堂文学是死文学,因而白话的文学在他那里便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用一条白话文学发展的主线贯穿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胡适之所以如此提倡白话,根本原因在于文言“不易教授”、“不易普及”。^{[3] (p141)}

实际上胡适也承认自己鼓吹的文学革命是“有意的革命”,他说文学史的进化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4] (p151)}这是进化论基石上的平民白话文学史观。胡适又指出这种文学史观不是由于文学革命的倡导凭空创造出来的。中国几千年的循环史观到胡适一代人那里被击得粉碎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进化观念成为他们那一代人观察世界的一个独特视角,实际上进化论观点引入人文社会理论领域之后所带给人类的灾难已经成为本世纪人类反思的一个重要主题,至于文学,则只有时代不同,没有进步与否,诗经之美和唐诗之美,唐诗之美和明清传奇之美,皆是文学史上蔚为大观的,只有时代精神转移,只有文学形式发展,却没有优劣之分,这应该是我们今日观察文学史演进的一个基本点。除了这种进化论观点外,还因为胡适为代表的启蒙思想者们所推崇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因为我拥护赛先生,我们一定要提倡新文学、新艺术和新宗教”,为什么“德先生”、“赛先生”能与新文学联系呢?这就是要构建起一个平民的、普遍参与的文学来支撑一个民治社会传统。中国几千年的臣民社会在胡适时代也是要全力抨击和伐撻的对象,由此出发,导致了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以及“全盘西化”这类观念的提出,然而到了20世纪末段,中国人开始反思这种状况。胡适的文学史观却正是建立在极力否认传统存在、极力否认中国并未形成市民社会的历史事实,生搬硬套地把文学史描绘成一种平民状态,这在当时自然有其启发民智导引民治的进步功效,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历史学主要书写的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谱”,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文学甚至是知识本身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作为一种垄断资源存在的,即使是在宋代以后,中国也并没有形成如西方式的市民社会,中国的文学发展主要还是由知识阶层来主导的。胡适文学史观的理论前提就建立在想当然基础上,是没有根据的。

① 梁启超和诗界革命派诗人的分化,具体论述可参见焦宝《晚清民国报刊诗词研究》,吉林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第三章“报刊诗词与文化变局”部分。

② 陈独秀氏为支持胡适而揭橥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者,即: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参见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

二

通读胡适的论述,“头等的小说家”“老百姓”这样自相矛盾的概念混乱使用,使人困惑,而作为百年来文学史叙述的总纲领,这种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学观念,近年来在学界不断深入的文学史研究中,也正因此逐渐成了困扰我们认识问题真相的根本原因所在。虽然有人不断地感到困惑、不断地发出疑问,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认清这种文学史观的谬误所在,这一方面是因为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文学史研究的基石就是在胡适文学史观的众多观点之上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人民性”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众多学者理论建树的潜意识当中。其实,这种对于文学史叙述的二元划分,对于民间的过分褒扬,对于文学发展脉络的简单化思维,对于文学史构建的主题先行式的架设,已经不能再讨论正确与否了,因为这些已经严重伤害了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混淆了我们对于文学史上一些基本问题和基本样貌的认知,使得我们无法理解文学史的基本发展脉络,影响了我们认知当下文学发展的态势,更使得我们无法认清未来文学史的发展趋势。

文学的历史,从来都不单纯是作家作品构建起来的单维度线条,文学的回忆和历史追述,也从来就不是超时代的单一逻辑,因此,批评百年来以白话为中心、以平民(小百姓等)-文人(文士阶层等)这样含混不清的概念来构建二元对立的文学史观,并不是否定前辈们尤其胡适等人在中国社会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转型时刻,将知识普及、文学新民、文化民主的希望寄托于斯的努力,更不是否定他们借此实现中国的文学文化、政治社会等全方位现代化的勃勃雄心。只是,当时代迁演,学术逐渐脱离为了实现其他目的而为学术的指向,而回归到学术求真的初旨或者说起点之时,我们就有必要拨开重重遮蔽的观念,而从求真这一基本观念开始重新出发。木斋的研究,在我看来,正是从求真出发的最基本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说,木斋所进行的研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比让一切学术研究为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服务的前辈们,实在是卑微的很,毕竟,求真,听起来远没有“德先生”、“赛先生”那么高伟和激动人心。

木斋近年来的研究,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曲词发生和以《古诗十九首》为核心的五言诗发生两大领域。曲词的起源发生问题,是词学史讨论已久而争论尤多的问题,《古诗十九首》创作者、创作时间和背景问题,亦被称为五言诗研究中的千年疑案,而木斋针对这两大悬案发表了数十篇系列论文,并先后撰成《曲词发生史》《曲词发生史续》《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等专著,迅即在学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①

木斋的曲词发生研究,其根本结论是曲词产生于盛唐宫廷,乃是宫廷文化的产物,这一结论,直接颠覆了百年来的曲词研究。对于曲词起源发生问题,虽然不乏如李白为“百代词曲之祖”之类的观点,但近百年来,文学史叙述中曲词是民间的创造,这一观点似乎已是不可动摇的词学研究基石。而木斋的研究经过对曲词概念的准确界定、对词与乐源流关系的梳理、词体成立与演进的历程钩沉,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回首总结和反思这一研究时,木斋亦赫然发现,原来自己的研究正与胡适所确立的这百年文学史叙述背道而驰。

在曲词研究中,曲词的民间创造说本身混乱不堪的逻辑、前后矛盾的叙述以及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得其本身即不堪一击,加之学界对于此问题已经有长久的讨论,因此木斋的结论便也较能得到学界的认同。相比而言,木斋的《古诗十九首》研究则引发了较大的争论。木斋不仅仅是将《古诗十九首》的主要作者从最底层的无名氏直接定位到曹魏乃至曹植,更重要的是,将向来被视作汉诗的《古诗十九

^① 相关讨论可参考《社会科学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中国韵文学刊》等刊物的专栏。在这一场讨论仍在持续之时,2012年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宇文所安教授的《中古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在大陆出版,其中对于五言诗问题,与木斋殊途同归、大体相似的结论,也引发学界的兴趣。可参见张朝富《事实与逻辑之间:木斋、宇文所安“汉五言诗”研究的启示与追问》,《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2期。

首》移出汉诗之列,且按照他的观点,目前所谓的汉诗大都是可疑的。如此一来,将置学界诸多汉诗研究论著于何地?由于宇文所安先生《中古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一书也有类似结论,文学研究界近年来形成的独立思考、各不相扰局面,便就此为木斋和宇文所安所打破,这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与文学史叙述传统背道而驰的问题,而是直接伤害到了当下众多汉魏古诗研究学者的感情和利益。当然也有学者从中开始反思,“按照木斋和宇文所安的认识,大家兀兀所营之汉魏古诗版图,不仅虚空,原为徒劳,更折射出我们一直的思考和做派出了大问题,想来心惊”。^[5]所以,非常明显的对比是,与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不吝赞美不同,国内学界对于《中古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一书表现出尴尬的状态。

众所周知,木斋起步于苏东坡研究,成名源于主持大型文学研究工具书编纂,这样的研究和学术工作,极容易获得声名和称赞,木斋何以要转向做这样的研究?

木斋曾回顾自己的研究经历,“我所研究的领域,不论是五言诗起源还是词的起源发生史,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摸索,并未有任何先入为主的系统理论作为引导,若说是在方法论上有所体会,也是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朴素哲学思想,结合长时间中国诗歌史流变写作的规律自行总结出来的,难登大雅之堂”。^[6]百年来的文学史叙述则不同,除了具体的框架外,如胡适的平民史观、白话史观等已经深入了文学史叙述的“潜意识”,构成了文学史写作的“系统理论”。以这样的“系统理论”来审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与“摸着石头过河”,见一说一的研究相比,自然更容易建立起系统的大厦,但有多少历史真实被“理论”所遮蔽,又有多少被刻意忽略,而无人问津了。

因为是“摸着石头过河”,木斋的学术研究,其唯一的指向便是求真,他不止一次地表白,“我又认为学术的本质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学术研究没有策略,只有真实”,^[6]从求真出发,渐渐发现曲词不是民间所创作,又渐渐发现《古诗十九首》在汉诗中实在无处安放,更渐渐发现《古诗十九首》竟然是曹植与甄氏间隐秘恋情的诗性表达而全然与下层无名氏不相干,这就不能不促使人反思这些说法的源头在哪里,这才终于找到了百年文学史写作的总教师胡适的平民与白话文学史观那里。在经历痛苦的探寻后,才发现“学术研究应从历史文本出发,从诗歌史演变规律和实际进程出发,而不是以前辈学者或者当今权威学者的评断作为研究的始发点”,^[6]如果说反思,木斋便是从如此直接的道理中觉醒并开始反思的。文学史研究作为一种历史研究,其目的便在于寻求历史真实,即便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当代叙述,也不能以建构取代真实,陷入历史虚无之中。这本是常识。由此反思自身的思考与写作,便更心惊,我们何尝不是大段大段引述某古人某先贤之论,便以为论据?

因为求真,木斋对白话文学、平民文学史观便产生警惕。他直言“近年来,笔者围绕五言诗和曲词的起源发生问题进行研究,都指向了对民间说和无名氏说的批判。有学者认为,这种研究是对传统学术的颠覆,其实,笔者所颠覆的,仅仅是在意识形态笼罩之下的现当代学术话语。从词体起源发生的研究来看,笔者试图对胡适以来的民间学术史观进行反思,推翻所谓词是由民间先创造、文人后学习的民间词史观,建构以诗人为中心,特别是以卓越诗人以及士大夫精英为中心的文学史观、文化史观,而这一结论,恰恰与古人的诗余说、李白词为百代词曲之祖等较早的说法是吻合的。从五言诗起源发生的研究来看,则是对古今以来两汉说的颠覆,重归钟嵘所说的‘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的最早说法。就本质而言,两大起源发生研究,都是对一个世纪以来疑古思潮、民间创造思潮的否定,其本质是对传统学术的回归。”^[7]在这样的反思基础上,文学史上的创作主体究竟是谁,是“老百姓”?是“群众”?这些所指模糊的概念,看似平民,却正是某些精英居高临下提出的。木斋便又提出了一个被否定了一百年的常识“诗史本由诗人写”。^[8]

至此才可以说,木斋的学术反思真正实现了学术思想上的转向。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木斋所代表的是新一轮史观转换的开始,即由为求善的学术研究向为求真的学术研究转换的开始。因求善而沦于矫饰、伪善,不仅未能走向“善诱”的启蒙路径,反而因粉饰涂抹失去了真相,使人产生欲摆脱被欺骗骗地的离心力。这恐怕也是百年前的平民文学启蒙者预料之外的。

三

木斋的学术研究,看似创新,实则复古,而“复古”也可以成为史学研究的追求之一,尤其是在历史被涂抹的面目不清之时,寻求历史的真实便更是重要的基础工作,因为求真虽说是学术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恐怕也是最根本的方法。而木斋的学术研究引人深思的便是“复古”,也即寻求历史真实的方法。若说对白话文学、平民文学史观的反思,是在“道”的层面重新确立文学史研究的原则,那么唯有寻求到了具体方法,才能真正实现求真的目的。

将文学史视作家—作品(文本)罗列,将所有目光盯着作家—作品,是百年文学史叙事的惯性传统。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开始反思这样的情形,比如袁行霈先生在其影响广泛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中便以极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呼吁,将文学放置到传播过程中进行考察,并强调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学创作的状况是取决于传媒的”。^{[9] (p4)}而如何在具体研究中将文学放置在传播过程中进行考察,宇文所安和木斋都给出了极好的研究思路。

宇文所安的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无论是哪一领域的研究在国内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其唐诗研究相比,《中古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所体现的学术方法与学术思想无疑更为重要。

在《中古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的封底上,宇文所安拈出了一段话,这一段话,可以视作这一著作的核心思想:

这本书展现了文学研究不那么可爱的一个方面:研究诗歌的内在运作机制,以及它的断片是如何被挑出来,组合为一个美丽的整体。……“西方”学者和东亚学者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也即将文本当作其创作时刻的本来状态对待。但在理解早期诗歌中没有比这更加误导的观念了:早期诗歌是一个存在于复制状态中并通过复制而为我们所接受的诗歌系统。知道和传播诗歌的人、表演诗歌的乐师以及后代的抄写者和文学选集的编者都会对它们进行复制。而在复制的时候,所有这些人都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动文本。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改动的痕迹常常十分明显,诗歌的扩张和缩短都有较大的自由度。^{[10] (p21-22, 24)}

将整个“早期诗歌”即古诗放置在一种手抄传播的文化环境中,基于对手抄传播特征的考察,指出这些诗歌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形,这便是宇文所安能够取得突破的原因。木斋的方法有类似之处,将整个《古诗十九首》放置在其传播语境中,逐一寻求其传播要素,从创作者、阅读者、传承者诸多角度出发,分析其失去主名的原因。另如,木斋在曲词研究中,“应”的观念,应制、应歌、应社等考察,便将曲词在不同阶段上的传播环节,从创作者、传播者乃至创作心理、传播状态等诸多方面解释地清楚了。

将文学放置在具体的传播生态中进行考察,这是在文史结合、诗史互证等研究方法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目前文学传播学的研究,已经引发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然而文学传播研究如何深入,宇文所安与木斋的研究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从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来说,木斋的学术研究能取得如此突破,自然不止这一点启发,对此学界和木斋本人都有反思。^①然而,木斋的学术研究尤值得关注的是其学术思想的转向。

百年来的文学史遮蔽了太多文学史实,比如,在白话史观影响下,近百年来的诗词创作传统便被无视,甚至近年来学界尤在大规模讨论旧体诗词能不能入史的问题,^②对于这一点,学界实质上已经有深

① 刘跃进《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从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说起》,《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龚斌:《惊人之论 精湛考索——关于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的思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张法《略谈木斋对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推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焦宝《五言诗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以木斋近年来的五言诗研究为核心》,《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冬之卷等皆是此类总结与反思文章。

② 相关讨论参见陈国恩《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王国钊《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3期、王泽龙《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20日)等多位先生的文章。

刻的认识。若将木斋的学术研究放置于学术史视野中,则不难发现,其学术研究背后的思想转向——突破最为典型的平民史观、白话史观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束缚,重建学术求真的原则,探索学术求真的方法,实质上已经渐渐成为时代学术风尚,正如龚斌先生在评论木斋的研究时所说“复原文学发展的真实历史,并且从当时的整体文化环境说明之,这是研究者的应尽责任和根本追求。积极进取,不畏艰难,敢于攻坚,敢于质疑和突破前贤的旧说,这是研究者的勇气。梁启超说错,或王国维没有看出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质疑,不能有所发现?学术随时代而前进。木斋之所以能有新发现,得出新结论,从根本说来,也是受惠于新时代的赐予。”^[11]学术随时代而前进,这是催人觉醒的话,也是木斋学术思想转向得以实现的关键,而敢于突破“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的藩篱,正是木斋学术思想的核心,“学术研究应该是审美的,而非功利的;应该是探索的、创新的,而非因袭的、陈旧的;应该是整体的、流变的、联系的,而非局部的、僵死的、孤立的;应该是超越古人的,而非迷信盲从的;同时,更应该是超越本时代的,而非受当下意识形态支配的”。^[6]这段话或许最能代表木斋对于学术的认知,也最能体现学术研究求真的追求。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 汗漫录[N]. 清议报, 1900-02-10.
- [2]胡适日记全编[M]. (第2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 [3]胡适. 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A]. 胡适文集[M]. (第1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4]胡适. 白话文学史[A]. 胡适文集[M]. (第8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5]张朝富. 事实与逻辑之间: 木斋、宇文所安“汉五言诗”研究的启示与追问[J]. 中国韵文学刊, 2013(2).
- [6]木斋. 《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反思[J]. 社会科学研究, 2010(2).
- [7]木斋, 焦宝. 曲词民间起源论检讨[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4).
- [8]王一娟. 诗史本由诗人写, 何由散落到民间——木斋先生访谈录[J]. 天中学刊, 2012(3).
- [9]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 [10]宇文所安. 中古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M]. 胡秋蕾, 王宇根, 田晓菲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11]龚斌. 惊人之论 精湛考索——关于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的思考[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1).

(责任编辑: 张立荣)